

should better investigate the motives that are hidden behind the narratives of ancient historians. This way we may get much more consistent stories than by using books of history as a quarry for historical facts.

HANS VAN ESS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Crises and Reform in the Qing Empire. By Wensheng Wang. Cambridge, MA;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vi + 339. \$39.95/£33.95.

在清史研究中，嘉慶（1796–1820）一朝向被視為盛極而衰的一個轉捩點。相對於十八世紀盛清與鴉片戰後衰敗的兩個研究相當透徹的時代，嘉慶朝的二十五年充其量只被視為分隔前後兩個鉅變時代的一段平凡插曲。史家如孟森等或以「守文之主」評價嘉慶皇帝，認為他親政後，雖能對前朝弊政有所補救，但對當日國家根本問題並無決心與勇氣徹底清理，只能在枝節上補苴匡救，實不足與言大有為，亦無能力阻擋清王朝的衰敗。1976年 James M. Polachek 提交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博士論文“*Literati Groups and Literati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方對前人所誤解的嘉慶朝維新有所重估。數年前 Daniel McMahon 撰文指出，¹近代史家或從十九世紀清帝國坐困於內憂外患的視野來評價嘉慶皇帝，其時士人所論迫在眉睫的朝政衰敗，更強化了近代史家的論證。事實上，嘉慶皇帝親政後所作的革新努力，藉著對意識形態的算計與操弄，將其政敵和珅（1750–1799）的形象盡情糟蹋及刻意反面描畫，提升革新的合法性，激勵士人和大眾對革新的支持。革新外觀上似求助於儒家傳統，實質上卻是極具選擇性地、創意地及實效地運用了傳統。McMahon 認為，以此為基礎，嘉慶皇帝所信任及選拔的地方官員，在區域重建努力的成果，儘管無法力挽狂瀾，卻明顯緩解了十九世紀初時人所理解朝政衰敗的徵候；在飽受動亂蹂躪的地區，和平及社會秩序即便脆弱，仍苟延殘喘到清末。

Polachek 及 McMahon 等人的論著，或因篇幅及聚焦所限，仍有不少待發之覆，唯一致揭示了過去史家對嘉慶初期革新性質的一般認識，或失之片面而未能持平立論。新一波修正學派對嘉慶朝政提出更為肯定的看法，具體業績可見於2010年3月

¹ “Dynastic Decline, Heshen,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Xianyu Reform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s., 38, no. 2 (June 2008), pp. 231–55.

在美國賓州費城舉行的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以“Reconfiguring Sovereignty”（統治權重組）為題的討論小組所提出的論文。小組其中一篇論文“Social Crises and ‘Inner State Building’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由王文生教授提出，本書即為王教授在這領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作者表示如要對晚清歷史形成更為細緻及動態的瞭解，實有必要從進化及前瞻的觀點，重新檢視先前國家成敗的認識（成王敗寇思維方式的影響）。在前人修正嘉慶革新研究的基礎上，本書目標在於檢視乾隆、嘉慶之交的主要變化及其對隨後清代歷史的意義。作者藉著重探當時社會抗爭的政治活動，以及其如何導致十九世紀國家的方向重定，系統地重估嘉慶皇帝及他表面好像平凡無光的朝代應有的歷史地位，重新連接嘉慶一朝與其前後時代中斷了的歷史論述。作者從乾嘉之交的白蓮教亂與華南海盜切入，檢視其時不同層級對這兩大相互關聯的危機的因應及控管，內憂外患交集是否為朝政衰敗無可挽回的標誌？他的主要論點厥為這兩大動亂，對清帝國及其社會具有累積效應的影響，驅使嘉慶皇朝重新改組定位，從而為大清帝國及其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中的結構轉變，締造決定性的機緣；對乾隆盛世主要卻往往被忽略掉的怨憤不平，本書也一一揭露。乾隆皇帝營造大清帝國的顯著成功，實以過度剝削已難以支撐的國家資源，耗盡政治上可持續發展的潛力為代價而獲得。為了應付危局，使政權存活下來，他的繼承人嘉慶皇帝啟動務實的戰略退卻，使乾隆晚期役使過度的國家，掙脫超負荷、滋民變、難管治的惡性循環，恢復它與社會之間管理責任的均衡，回歸到可持續發展之途。作者認為幸虧嘉慶皇帝務實而穩健有節的革新，在政治方面開啟了大轉變，這也許是鴉片戰後，陷於內亂外患交織，危機四伏的大清帝國，尚能存續到1911年的要素。

全書除導論及結論外，共有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對十八世紀的歷史背景及其變化主要動力提出一個概觀。這部份以短短一章從國家及社會視野，闡釋當時國家不堪負荷的結構、事態及人事三維度範圍廣闊的發展，以及啟動乾嘉之交危機的起源，認定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統治風格是問題惡化背後的主要動力。作者認為乾隆本人方向錯誤的政策及不切實際的目標，對十八世紀末葉動亂的時機及嚴重性具有重大影響。全書主要由二、三兩部份組成，分別涵蓋社會與國家。第二部份包括二、三兩章，採取地方及從下而上的取徑，將兩大動亂置於邊疆政治脈絡中考量。這兩章聚焦於內部橫跨湖北、四川及陝西三省邊境的漢水流域山地，以及外部跨越中、越兩國海域的南海海疆，檢視乾嘉之交，流動易變的獨特邊疆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模式，與僵硬虛弱的政治體制相互作用，產生一種非國家公權力所能及的空間所促成的白蓮教及華南海盜兩大動亂，以及動亂如何形塑社會動員與帝國營建的相互纏繞進程。占全書篇幅最多者為第三部份，作者將焦點從邊緣轉向中央，從社會民眾抗爭移往高層政治領域的國家戰略退卻，從宮廷政治轉移到對外關係，檢視其間相互作用所產生國家營建的主要內在動力。這部份由四、五、六、七合共四章組成，探討全書最重要的問題：兩大危機結合，怎樣形塑嘉慶皇帝營造內心深處國家的努力？鑽研不同層級從上而下對危機管控、制度重組和政策改變的進程，採取不

同的策略與識見所引起的衝突及妥協，探究皇帝、官僚及外國之間針對動亂交織一起的回應，對於權力重組及晚清最後百年歷史的深遠影響。

本書既為一項挑戰國家糜爛、無可救藥的成說的翻案研究，一般作者可能有意無意間，往往抱同情的態度，將嘉慶皇帝及其朝代的正面積極貢獻過於肯定和誇大，卻漠視其不利後果，致距離歷史真相愈來愈遠。本書作者自知其論述易招言過其實的指控，故雖對研究對象抱「瞭解之同情」，卻能攻守兼顧，有縫必彌。他強調嘉慶革新，既非每一部份都是有效、有益和有意義的，嘉慶本人頂多是他那時代的君主，決不是劃時代的統治者。這位務實的皇帝既沒有和過去作革命決裂，也不能挺身而出，將國家及時近代化，應付西方入侵的前所未有挑戰。重要的是，我們切不可忽略嘉慶革新，雖離圓滿成功尚遠，卻防止了同時並發的動亂，激化成為對清帝國難以控馭的威脅。針對嘉慶革新如何急轉直下，至鴉片戰後國運顛危的質疑，作者的解釋也能自圓其說。他認為嘉慶皇帝決定性的介入，將不堪負荷的帝國引向持續下去的道路。儘管這一努力營造出一個時代的中興氣象，但嘉慶經營留下的遺產，不但取決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因素及進程，更繫於與更大的世界體系不斷發展的交往接觸時，偶發的相互作用。清朝最後崩潰，國力日益衰落，領袖素質退化，固然是原因，而更應歸咎於不可抗拒的跨朝代、跨國界及全球的轉變進程。足證作者盡力提出證據，建立自己的論點而外，也縝密思考問題，多方尋覓孔隙，找出適度及合理的解釋預為辯解。

本書一大特色厥為作者運用諸如年鑑學派 Fernand Braudel 的長、中、短時段歷史研究體系，以及多位名家所提出多樣的史學及社會科學理論，系統地建立分析架構，對事件深入分析，提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解。如乾嘉之交兩大危機——白蓮教亂與華南海盜，前人已有相當研究成績，也不乏當行出色的論著，但幾無例外都視之為互不相屬的事件。作者試圖提出一個環繞他稱作「全方位合圍抗爭危機」概念的更為全面的說明模型，將集體行動中好像分散的片段聯繫起來，兩大動亂被視作連串具歷史關連、相互補強的中心事件所表現的一個完整進程，俾能闡明動亂多方面聚合的相互作用，怎樣引起關鍵性的歷史變動，對其時國家與社會產生推動結構改變的影響。作者也利用這說明模式，解構國家的主要組成部份，察看不同張力對其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們怎樣作出不同的調適妥協。他認為這重要概念，有助於彌合及填補解說事件與結構之間的缺口。這一總體及相互的觀點，也將中央國家、地方社會、民眾和菁英文化帶到共同語境內，在複雜的相互作用中發現動力的新成份。

作者指出，過去二三十年來，中國中心史觀及地方化傾向支配明、清史領域，對外關係的論述或多或少被邊緣化，近來對外關係的學術討論稍見回復活力，實為可喜趨勢。這些新研究表明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理路，若不與一系列複雜的外部因素聯繫起來，實非吾人所能瞭解，蓋外部因素往往干擾內部所產生的變遷原動力，導往新趨向。從地方小規模冒險事業變為國家及國際主要威脅的華南海盜動亂，提供檢視這些複雜的相互作用及變化的一面稜鏡。他強調這進程的討論及其多面向的

影響，將晚清史變化動力的思考，超越西方發動的挑戰回應，或獨以中國為中心的片面偏頗史觀，蓋二者都不能全面解釋十九世紀的大清帝國，作為一個開疆闢土的民族國家，怎樣將其重組定位。這兩典型可由一個跨國、跨區域，靈活而無約束的多維透視予以增補充實，將中國及其鄰國多方面歷史變動（國內政治、區域伸介及國際外交）的相互作用進程緊密連結在一起。要將中國與西方的膠轕作更概念化的論述，在中國被西力壓倒前，先檢視內部及區域所產生的動力頗為重要，這樣可深化吾人對作為催化劑的西力作用，在晚清史中的幅度及局限的瞭解。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外交，逐漸導致領土主權新概念的先兆出現，改變中國與其鄰國及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精微而重要的進程，可當作是像西方 Westphalia 式主權²的表徵正在醞釀，而不是朝代衰敗徵兆的開始。

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雖有助於分析及理解問題，但畢竟只是研究的輔助工具，就一本成功的史學論著而言，史料翔實還是最基本的因素。就書中所見，作者以最大努力，徹底蒐羅大量原始史料，掌握近代中外學人的相關重要研究動向，經過細心解讀，縝密思考，謹嚴論證，揭示重要問題，故這部徵引繁博，下過深刻功夫的結實論著，成果豐碩，超越前修，絕非偶然。本書引用尚未刊行的檔案，包括嘉慶宮中硃批奏摺、嘉慶軍機處錄副奏摺、軍機處錄副奏摺（剿捕檔）、軍機處錄副奏摺（農民運動類）、軍機處錄副奏摺（善後事宜檔）、軍機處錄副奏摺（隨手登記檔），以及已刊行的一手文獻資料，如《嘉慶實錄》、《嘉慶起居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中國恭王府檔案總彙：和坤秘檔》、《剿平蔡牽奏稿》、《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史料》、翬生文《從戎偶筆》等，可謂洋洋大觀。美中不足的是，相對於一手官方原始文獻，作者對於當日有志於領導激進政治改革的士人如洪亮吉、張惠言、王昶、惲敬等的著作，似乎重視不足。職是之故，對於他們藉多面向的危機，喧嚷廣泛徹底的社會政治變革，應付嚴酷現實的思考，似尚有待探討的餘地。

本書一些可資商榷之處，謹就閱讀所見，提出以就教於作者。首先，作者認為，考慮到其時國力衰退及國家所面對的挑戰，包括因十九世紀初全球白銀減產、供應突然下降所引起的空前財經危機，嘉慶皇帝的改革開啟了一段鞏固及復原時期，持續到帝制結束，這是一項引人注目的成就（頁13）。頁247，作者更對前述的財經危機有所補充。他指出十九世紀頭十年以降的三十年間，英國向清發動鴉片進攻，大大減少了中國國內可用的白銀數量，造成銀貴錢賤，使嘉慶朝改革的建設性效應黯然失色。可是，有別於前面二段所述，作者在頁194中指出，嘉慶為了削減乾隆以來官員的苛索，促進通商，於嘉慶四年（1799）下旨，將加派於大多數稅關的盈餘額全國減免，又立誓要將三年比較的起反作用的做法終止，代之以較為固定及

² 原指 1648 年 10 月在日耳曼西北部所簽訂結束三十年戰爭的和約，成為近代國際關係的基礎；和約內容有幾個重要原則：國家主權、平等及不干涉他國內政。

可預知的盈餘制度。他的節制政策由其繼承人道光皇帝所延續。據倪玉平的新近研究所示，嘉、道兩朝的關稅總數仍能維持乾隆朝晚年的水平，每年五百萬兩上下。這項新發現提示十九世紀初，清代對外貿易的總規模並沒有縮小，從而向被廣泛接受的「道光蕭條」理論提出挑戰。³這理論認定當時的嚴重困難，主要因白銀外流，市場能動性不斷下降所致。按倪氏僅認為「根據檔案實際統計出來的趨勢，在嘉慶道光時期，關稅徵收相較於乾隆時期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下降，……〔故〕不能通過嘉道時期關稅收入的變化，來論證道光蕭條」。⁴另一方面，倪氏也指出「銀貴錢賤，國家課稅，兵民商工，無不深受其害」。⁵他並未否定道光蕭條之說。作者似沒有全面完整掌握倪氏的正確語境，易滋讀者前後論述不一的理解。

書中對另一位貪婪無能不下於和珅的滿州大員福康安(?-1796)著墨不多。作者提到隨著軍機處中滿、漢大臣阿桂(1717-1797)、王杰(1725-1805)相繼於嘉慶元年(1796)辭去職務，翌年另一大臣董誥(1740-1818)因母喪去職；阿桂而外最重要的將領，一度為和珅彈劾的福康安，亦因嘉慶元年五月與貴州苗民作戰時早逝，而從政治舞台消失。所有這些人事變動，與白蓮教起事一起發生，使和珅能加強他對文武官員的控制(頁136)。在作者筆下，福康安似乎予人正面的形象。事實上，乾隆五十四年(1789)彈劾福康安者為和珅之弟和琳(?-1796)，或因福康安和乾隆皇帝的特殊關係，深得乾隆器重寵信，而為和珅所嫉視，故在背後策劃彈劾。福康安與和珅之間雖有嚴重矛盾，但論當日官場貪腐，和珅而外，便要數福康安；其弟戶部尚書福長安即為和珅重要黨羽。福康安「到處婪索，妄作威福，……每一征戰，糜費多而成功少」。嘉慶時論旨即有「福康安歷任封疆，簠簋不飭」之語；時論更認為乾隆晚年朝政敗壞，內則和珅，外則福康安，二人難辭其咎。⁶

對於乾隆六十年(1795)在湖南、貴州邊境接壤之處爆發的苗民起事，作者表示實紮根於將土司置於中央直接治下的改土歸流的行政管理進程；這政治一體化的政策，最初由十八世紀初傑出的滿人官員雲貴總督鄂爾泰(1680-1745)落實執行，促成漢人迅即移居到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區，從而直接激起族群衝突，觸發苗民反叛(頁20)。事實上，據新近相關論著所示，早在明代中央政府對西南的政策，便是軍事征服與積極及大規模的殖民。十八世紀二三十年代鄂爾泰在西南積極開展改土歸流的措施，應被視為中國對西南拓殖的結束，而非開始。⁷至於作者所說苗民起事，

³ 參倪玉平：〈清朝嘉道時期的關稅收入：以「道光蕭條」為中心的考察〉，《學術月刊》2010年第6期，頁134-46。

⁴ 見倪玉平：《清朝嘉道關稅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50-61；倪玉平：《清朝嘉道財政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14-26。

⁵ 倪玉平：《清朝嘉道財政與社會》，頁348-58。

⁶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卷中，頁230-31。

⁷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ivil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12, 132-37, 236.

可以描述為針對清代盛世所出現的積極推行的國家營建努力的「延遲了的回應」，筆者相當認同。

大書難免小誤，謹就所見提出以供作者參考：

一、音譯方面：頁272注41，Wang Ganwang 實為 Wang Tanwang (王覃望) 之誤；頁277注58及頁278注65，qingba shanqu 實為 qinba shanqu (秦巴山區) 之誤；頁278注64，The most important pathway was *shudao* (plank roads)，*shudao* 疑為 *zhandao* (棧道) 之誤；頁310注14，nongming 當為 nongmin (農民) 之誤；頁317注129，liangchao wen zhongxin 當為 liangchao wei zhongxin (兩朝為中心) 之誤。

二、引用資料方面：全書都將《從戎偶筆》的作者 Gong Shengwen (鞏生文) 誤作 Gong Wensheng；頁262，KJFSB . . . (Taiwan: Tailianfeng chubanshe, 1970)，Tailianfeng 實為 Tailian guofeng (台聯國風) 之誤；頁272注43，Quan, *Zhongguo jingjishi luncong* (Essay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Hedao chubanshe, 1996)，應作 *Zhongguo jindai jingjishi luncong* [《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 (Essays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Daohe [稻禾] chubanshe, 1996)；頁283注15，Mio Kishimoto-Nakayama, “The Kangxi Depression and Early Qing Local Market,” *Late Imperial China* 10 (1984): 227–256。張冠李戴，*Late Imperial China* 實為 *Modern China* 之誤；頁295注59，JQJCSSD 漏列檔案編號；頁298注110，ed. Chen Pingyuan et al. (Wuhan: Hubei Jiaoyu Chubanshe)，出版社後面應補上出版年份2004；頁315注103，ed. Clara Wing-chung Ho (New York: M. E. Sharpe, 1981)，1981實為1998之誤。

三、前後兩歧：頁108行9，福建布政使 Qiu Xingjian (裘行簡)，行14，Qiu 卻作 Qian，當以 Qiu 為正確。

四、年代及其他方面。頁231載1573年清當局於毗連大陸的澳門半島的狹窄地帶，構築防禦工事——關閘、哨站，1573顯為1673之誤，蓋1573年滿族尚未在關外崛起，建立政權。頁270注22，乾隆在新疆的勝利，給清帝國添加約二萬里的新土地，二萬里數據疑有誤。

就開創發明而言，嘉慶維新之說，前人或已有類似論點先作者而發，但本書貢獻在於全面而完整，以洞察的理路將看似不相干的要素貫串起來，編織成一個連貫故事，加以全方位分析，推翻很多過於簡單化的流行解釋，不苟同卻不刻意立異。論規模恢弘、史料蒐羅豐富、組織嚴密、問題處理精細周到及辨析入微，本書都遠超前人。本書的問世，勢必對嘉慶新政的重探，激發出更多更具意義的學術對話。走筆至此，筆者有一點抱怨：也許出於成本考量，書中應有的中英辭彙表及引用書目均闕如，大大不便於閱讀時前後相互參考。對於一家以刊行高素質書籍而聞名於世的機構，可能得不償失。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